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与贡献

陈平平¹, 孙美姝²

(1. 南京晓庄学院 生命科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17; 2. 南京市第三高级中学, 江苏 南京 210001)

摘 要: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是明太宗朱棣时期郑和六次下西洋的继续和终结。明宣宗朱瞻基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决策者和驱动者, 郑和、王景弘为此次航行的正使。此次航行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 以无敌的海军特混舰队为使团船队, 以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为指导。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担负着恢复和发展多个国家和明皇朝的朝贡关系; 调解国际争端, 维护地区的和平; 整修海外的基地; 恢复和扩展东西洋交通航线; 开展贸易, 采购物资; 促进亚非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物产等的交流与和平发展; 巩固明朝在国际上主导地位的重要使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使 26 国, 时跨三年, 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外交与航海活动, 体现了“各敬顺天道, 抚辑人民, 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

关键词: 郑和下西洋; 使团船队; 皇明朝; 交通航线

中图分类号: K248.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91(2018)03-0048-07

0 引言

郑和, 云南昆阳人, 是我国和世界古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第七次下西洋, 正处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与繁荣昌盛时期。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的归途中于 1433 年死于古里国之说, 成为我国近三十几年来的主流观点, 影响着郑和研究的发展。关于其死因的“殁于王事”、“死于和古里王的冲突”等观点, 造成了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结果等认识的分歧。近些年来,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 证明了这些观点违背历史事实而被否定。因而, 应当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和评价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相关史事。

1 明宣宗确定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使命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太宗朱棣去世。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下诏: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 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 俱回南京, 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各处修造下番海船, 悉皆停止。”^[1]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去世, 随后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 郑和船队停航已有五六年, 海外诸国同明皇朝的关系逐渐疏远, 朝贡国家大减。东南亚各国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局势不稳。海外威望的下降, 影响到宣德皇帝的声誉和国家的稳定。朱瞻基嗜书好读, 智识杰出, 悉文韬武略, 即位后励精图治, 君臣交傲, 兴利除弊, 任贤去佞, 为明代一守文令主。他审时度势, 决定委派郑和为正使第七次下西洋。

[明]巩珍著、向达校注的《西洋番国志·敕书》中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敕书记载: “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 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 大小舡六十一只, 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钱粮并赏赐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 及原阿丹等六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纛丝等件, 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锅人情物件, 及随舡合用军火器纸割油烛柴炭并内官内使年例油烛等物, 敕至, 尔等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监洪保等, 关领前去应用, 不许稽缓。故敕。”^[2]这一敕书使后世知晓明宣宗令郑和等下西洋诸国的大致时间、船队舰船数目、所载物资及有关领导人员的姓名。

《明宣宗实录》六十七卷宣德五年六月戊寅条记载: “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 朕恭膺天命, 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 体祖宗之至仁, 普辑宁于庶类。已大赦天下, 纪元宣德, 咸与维新。尔诸番国, 远处海外, 未有关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 其各敬顺天道, 抚辑人

收稿日期: 2018-05-31

作者简介: 陈平平(1935—), 男, 江苏南京人, 南京晓庄学院生命科学系教授。

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凡所历忽鲁磨[谟]斯、锡刺[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喃[南]渤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鞠[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彩币有差”。^[3]通使诏谕阐明了明皇朝宣德皇帝的继位,重申了继续执行朱元璋、朱棣与海外各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外交方针,表明了赏诏往谕诸国的名称,明确了第七次下西洋的主要使命。

2 强大的使团船队是完成使命的有力保障

2.1 人员众多,组织严密

[明]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条载:“今得宣德中一事,漫记其概;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艕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4][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宝船与人员》条载有某次下西洋人员,“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书手,总共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5]第七次下西洋人员数目较之少一百二十人,但人员组成种类则应与其相似。由上述记载可知,第七次下西洋使团船队由五部分人员组成,组织系统严密。

(1)领导核心与行政管理系统人员。《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之署名:“宣德六年次岁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显然,这11人乃是使团船队的领导核心,其有9人是太监。从排名次序看正四品的正使太监2名、副使太监7名,均位于正二品的都指挥之前,可见宣宗是以太监掌控使团船队。副使常统领分舵。少监、监丞、内官、内使等作为行政官员分别参与分舵、各航行督察监军之责。

(2)军事系统人员。军事系统人员负责使团船队的安全保卫工作,应对突发的武力冲突、确保胜利,并担负多种劳役。《永乐十五年郑和於泉州回教先贤塚行香石刻》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可见,郑和作为历次下西洋排名第一的正使,还是钦差总兵太监、使团船队的统帅、军队的首领。在其下依次为二位都指挥、众指挥、千户、百户、旗校、勇士、力士、军人等。军人在使团船队人员中占有绝大多数,可见这是一支真正的远洋海军舰队。

(3)航海技术人员。火长即舟师,为各船中指挥航海者,舵工按火长指令操舵,控制航向。班碇手负责起落船锚,铁锚、木艕、搭材等匠负责船舶维修保养,水手、民稍、余丁等负责升降船帆、摇橹、划桨、撑篙和船上杂务,阴阳官、阴阳生等负责航海天文观测、海洋气象预报。

(4)外事系统人员。其正使、副使等主持开诏宣谕等大典,负责外交谈判、外贸决策等。买办负责采购,教谕负责文化交流,通事负责涉外翻译,舍人负责相关文字工作。

(5)后勤总务系统人员。户部郎中掌管钱财与后勤供应事务,书算手负责会计出纳工作,医官、医士负责医疗保健和防疫事宜。

2.2 船队庞大,装备精良

关于第七次下西洋船队的舰船数量,前述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敕书称有“大小舡六十一只”。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中记有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4],前者为船号,后者为编号,还记有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指出了船只以人力驱动的橹的不同规格和数目。

《南京静海寺残碑》载有:“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2010年6月,在南京祖堂山发现了《大明都知监太监洪保寿藏铭》,其中述及:“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船,赍捧诏敕使南洋各番国,抚谕远人。”可见,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不仅拥有一千五百料、二千料,还拥有五千料的海船,当然还拥有大八橹、二八橹之类,是一支含多种类型船只的特混舰队。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中的船若按功能分,大致可分为座船、战船、马船、粮船、水船等。^[6]《瀛涯胜览》述及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5]。关于“大者”是否实际存在,如今研究者的看法仍存在着分歧。“中者”[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称作马船(马快船),是一

种大型运输船,用以运输下西洋所需的物质与海外贸易的货物。^[6]战船,如静海寺残碑中所记载的“将领官军乘驾”的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它们当属于福船型,尖底、吃水深,长宽比较小,适于远洋航行。战船有充足的军事设施和装备,不仅有相应的冷兵器,还有相应的火器,如火箭、火枪、火铳、铜或铁质的铳炮等。粮船和水船乃是补给船。粮船用以运载粮草等,水船用以积贮运载淡水。《西洋番国志自序》述及:“缺其食饮,则劳困弗胜。况海水卤咸,不可入口。皆於附近川泽及滨海港汊,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舟者,已备用度,斯乃至急之务,不可暂弛。”^[7]

福船的打造满足了结构强度、稳性、快速、远航等多种要求。底部有龙骨,舷侧顶部有大楣,均由优质巨木制成,板材亦有足够的厚度,保证了纵向的强度;众多的隔壁、横梁保证了横向的强度;尖底、吃水深,保证了稳定性;各主桅杆挂的是硬质帆,辅助桅杆挂的是软质帆,可有效地利用风力。巨舵与锚符合航船的需要。

2.3 理论经验丰富,航海技术先进

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有清楚的阐述:“时愚年甫出幼,备数部伍,拔擢从事于总制之幕。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瀛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绝无纤翳之隐蔽。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斲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於水,指向行舟。经月累旬,昼夜不止。海中之山屿形状非一,但见於前,或在左右,视为准则,转向而往。要在更数起止,记算无差,必达其所。始则预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针经图示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7]

显然,郑和使团船队已掌握了相应的天文航海技术。无论在夜间航行或在水天一色的大洋中航行,均可靠观测日月星辰来辨明方向,利用观测天体的高度来测定船位,确定船舶的位置。向达整理的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中附有《过洋牵星图》四幅。^[8]这表明郑和使团船队在远洋航行中已经以“星斗高低,度量远近”,以“牵星为准”进行导航,应用了当时先进的天文导航定位技术——过洋牵星术。

郑和使团船队已掌握了相应的地文航海技术。海洋气象复杂多变,阴天雾日,看不到日月星辰,无法应用天文航海技术,必须依靠地文航海技术。舟师们以航海图为依据,利用航海罗盘、计程测深等工具,按航海图、针路簿所记沿途各地的针路、里程、海水深度、海底基质等导航。

《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全图以南京为起点,远到东非,含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五百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的地名约有300个,是15世纪之前,中国和世界上记载亚非两洲内容最为丰富的地图册。《郑和航海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它相当准确,所记录的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等也相当详尽。

郑和使团船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一种水罗盘。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指出,它乃“斲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於水,指向行舟”。^[7]对罗盘的应用业已超出了指示南北方向的范围,发展为用于测定针路,依靠其指向确定行船的方位、航速、航距和路线,并选择确定最佳的航线,还进而把天文航海“过洋牵星”即用牵星板测量所在地的星辰高度与水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确定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

陆标导航是古代船舶沿岸航行时常用的导航方法。《郑和航海图》描绘出的有大陆岸线、岛屿、浅滩、礁石、港口、江河口、沿海的城镇、山峰,等等。其中,有陆地上可作航行物标的庙宇、宝塔、桥梁、旗杆、卫所等,而利用山形导航则更为普遍。^[8]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五年(1430)至宣德八年(1433)。参加第七次下西洋的巩珍所撰的《西洋番国志》里记有天方国,而《郑和航海图》中却未绘出该国,可见该图是绘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即第七次下西洋时,使团船队已以此图为依据。

郑和船队以“更”、“托”、“针位”等方法航行。古代航海以“更”数作为航行的计时和计程单位,每一昼夜为十更,每更有60里(按《郑和航海图》计算,每更约为40里)。“托”指两臂张开伸直的长度,约2米。以绳结金属锤,锤下抹有牛油,将其放到海底,从绳子入水的长度测知该处水深,从锤底牛油上粘附的泥沙,可知该处的水底底质。“针位”指的是船舶用航海罗盘来确定的自身的航向、方位。

中国沿海冬春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适于船舶由西洋返国。郑和船队业已循此规律往返。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于宣德六年十二月出五虎门,于宣德八年七月到京。郑和船队在國內以长乐港为候风地点,在国外以马六甲海峡的满刺加、印度南部的古里等为中途候风地点,并在那里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郑和船队还利用了印度洋的风海流,顺流航达非洲的索马里等地。这些表

明郑和船队已经掌握了相关地区的季风与海流规律。

郑和船队运用了中国古代船民在长期航海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高超的驶风技术,通过操纵帆脚索变换帆角的办法,同时配合尾舵与拨水板,创造了八面驶风的驶风技术。郑和船队的船帆是纵向硬帆,可以桅为轴,旋转方向。当风向来自船尾,便立横帆受风;当侧后来风,可以拉斜帆,帆面垂直于风的来向,船可照常前进;遇斜逆风或逆风时,调整船帆迎风角度,使船舶呈“之”字形的曲折航线乘风前行。船舶在应用驶风技术时,船员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因为帆的升降、帆角变换、舵的操纵等均仰仗于人力。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述及:“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趋事人众,纷匠往来,岂暇停憩。”

费信《星槎胜览·昆仑山》条述及:“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9]郑和船队要克服这类危险,不仅需要掌握风汛、海流、潮汐等变化规律,还需要识别海水的颜色和掌握某些海洋生物分布的规律。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述及:“船到七洲洋及外罗等处,可算此数日流水紧慢,水涨水退,亦要审看风汛、东西南北,可以仔细斟酌,可算无惧。船身不可偏,……船身若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头鸟多。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泳流,多月拜风鱼。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郑和船队重视对危险海区海水颜色和海洋生物分布的研究,化险为夷,保证了船队的安全行驶。

前已述及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阐明了火长的重要性。鉴于火长事关船队安危成败,责任重大,郑和船队对火长的选拔任用十分严格。除了从闽广浙有经验的民梢中选用外,还招募了一些优秀外国海员出任。《明太宗实录》中就有番火长因参与下西洋而受重赏的记载。如卷71,永乐五年(1407)九月己卯,赏“番火长、钞五十,采币一表里”,卷118,永乐九年(1411)八月甲寅奖赏“番火长,钞百锭,采币一表里,棉布二匹”等。^[10]

郑和船队拥有自己的通讯联络系统。据《三宝太监下西洋记》记述:“昼行认旗帜,夜行认灯笼。”天气恶劣,如雾、雨、雪天,视觉不清,则用音响,如锣、鼓、号、爆竹、火炮等为号令,也可用小船载人传递信息。大船上载有马匹,登陆后可用骑兵传递信息。此外,还可利用信鸽与基地通讯联络。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使团船队实质上是一支庞大的,组织严密,装备精良,技术先进,当时无敌于天下的远洋特混舰队。它充分的吸收了永乐时期第一到第六次下西洋各次所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航海等各方面的宝贵经验和教训,目的明确,计划周详。

3 以传统观念统驭使团船队

洪熙元年停止下西洋活动至宣德五年其间,郑和船队被封,官兵调往南京镇守。有关的基地、祭祀场所、船舶均被冷落。宣德五年,郑和等奉命再度出使,国内的有关设施需要整修。

宣德六年春,郑和等所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述及:“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番国,艤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弘胜旧规。复重建岨山小姐之神祠於宫之后,殿堂神像,焕然一新。”^[11]宣德六年冬,郑和等所立《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述及:“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於宫之左,彫妆圣像,焕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他们又铸造了一口有“国泰民安”和“风调雨顺”字样的铜钟,还整修了福建湄洲岛天妃宫的庙宇等,分别进行了祭祀。^[12]

永乐十九年,北京皇宫三大殿火灾,被视为天谴。朝野非议迭起,朱棣下罪己诏,下西洋活动亦被暂停。第六次下西洋如周闻墓志铭载,“中途折回”。^[13]从此到宣德五年,下西洋活动即被冷落。宣德六年,郑和借朱瞻基下诏第七次下西洋皇命之际,先后在刘家港和长乐,以感谢天妃护佑灵异为名,后者更加上了对宣德皇帝的效忠之意,立下了两块著名的石碑。在《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中述及:“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竭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竭诚于神明!师旅之安宁,往迥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併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貽永久焉。”该碑阐述了郑和下西洋使团船队的规模,“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次数为“迨今七次”;还有各次下西洋的时间、经历、功业等。可见,正如《刘家港碑》所述:“是用勒文於石,并记诸番往四之岁月,昭示永久焉。”两碑达到了传世的目的,给后世留下了关于郑和七下西洋最真实和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表明了郑和是以敬神、忠君、爱国等观念统驭使团船队。

4 分工协作完成使命

关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往返时间,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述及: “宣德章皇帝嗣登大宝, 普赉天下。乃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兼督武臣, 统率官兵数万, 乘驾宝舟百艘, 前往海外, 开诏颁赏, 徧谕诸番。时愚年甫出幼, 备数部伍, 拔擢从事于总制之幕。往返三年, 经济大海”^[7]。可见, 宣德年间, 巩珍亲自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 往返历时三年。《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述及: “今得宣德中一事, 漫记其概……,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龙湾开舡……,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 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 二十日大舡船回洋, ……六月……二十一日進太仓, 七月六日到京”^[4]。可见,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航行是于宣德六年冬出国, 于宣德八年夏归国。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第七次下西洋船队如何完成涉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 远达非洲东部一些地方的众多国家的出使任务? 《西洋番国志·满刺加国》述及: “大舡宝舡已往占城、爪哇等国, 并先舡暹罗等国回还舡只, 俱于此国海滨驻舶, 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存贮。各舡併聚, 又分舡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 忽鲁谟斯等各国事毕回时, 其小邦去而回者, 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 装封仓储, 停候五月中风信已顺, 结舡回还。”^[14]可见, 使团船队采用了分工合作的方法, 正使、副使们率领大舡、分舡, 先舡又分舡次前后等方式分头去完成各自的任务。

5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国际意义

5.1 恢复和发展外交等关系

《明史·郑和传》(卷三百四)称: “宣德五年六月, 帝以践祚岁久, 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 於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5]《明宣宗实录》述及: “所历为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刺加、柯枝、卜刺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刺、刺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16]这里列举的国家只有十八个, 而巩珍《西洋番国志·诸国名》列举的这次所历国为二十: “占城国、爪哇国、旧港国、暹罗国、满刺加国、哑鲁国、苏门答刺国、那孤儿(小邦)、黎代小邦、南淳里国、锡兰国、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溜山国、祖法儿国、阿丹国、榜葛刺国、忽鲁谟斯国、天方国。”^[14]其中的占城、暹罗、爪哇、那孤儿、黎代、小葛兰、榜葛刺、天方等八国, 未曾记入。故此次所历诸国, 应为二十六国。郑和使团船队第七次下西洋正副使臣抵达上述诸国, 宣诏赏赐, 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外交活动, 恢复和发展了藩属国与宗主国的朝贡关系。

5.2 维护区域和平

洪熙与宣德前期, 海外某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趋向尖锐。如《明宣宗实录》卷七十六记载, 宣德六年二月壬寅(初七), 满刺加国头目巫宝赤纳等来京, 向明宣宗朱瞻基求援: “国王欲躬来朝贡, 但为暹罗国王所阻, 暹罗素欲侵害本国, 本国欲奏无能书者。今王令臣三人潜附苏门答刺贡舟来京, 乞朝廷遣人谕暹罗王, 无肆欺凌, 不胜感恩之至。”朱瞻基遂命巫宝赤纳等随郑和船队回国, 并令郑和敕谕暹罗国王: “朕主宰天下, 一视同仁, 尔能恭视朝廷, 屡遣使朝贡, 朕用尔嘉。比闻满刺加国王欲恭来朝, 而阻于国王, 以朕度之, 必非王之意, 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远虑, 阻绝道路、与邻邦起衅, 斯岂长保富贵之道? 王宜恪遵朕命, 睦邻通好, 省谕下人, 勿肆侵侮, 则见王能敬天事大, 保国安民, 和睦邻境, 以副朕同仁之心。”^[16]郑和在两国之间进行斡旋, 说服暹罗国王, 放弃了侵略。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使团船队代表大明王朝出面调停争端, 改善了多国之间的关系, 维护了相关地区的和平。

5.3 整修海外基地

永乐年间, 郑和第一次到第六次下西洋期间, 由于使团船队的实际需要, 通过外交途径, 如谈判、租借、共建、出资援助等方式, 在一些友好国家先后建立了一些海外基地。官厂就是郑和下西洋船队在海外设置的基地。如在《郑和航海图》中绘有满刺加官厂, 绘有苏门答刺官厂, 位于港外一岛上。^[8]巩珍《西洋番国志·满刺加国》^[1]条述及: “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 立摆栅墙垣, 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 “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贮。”有关的基地, 从永乐末期到宣德前期已闲置多年, 第七次下西洋时当然需要进行相应的整修。

5.4 恢复和扩展航线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恢复了第六次下西洋后一些已中断的航线。船队大船陆续派遣出分船,前往各国访问,有些还扩展了航线。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里程之去程为:中国南京龙湾—福建长乐—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忽鲁谟斯(今伊朗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4]对照巩珍《西洋番国志》则当为:中国南京—福建长乐—占城—爪哇—旧港—满刺加—哑鲁(《元史》作阿鲁,又名亚鲁、亚路、哑路,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岸马鲁蒙河口)—苏门答刺、那孤儿、黎代(均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南淳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角亚齐河下游哥打拉夜一带)—翠蓝屿(今印度尼科巴群岛)—锡兰山别罗里(今斯里兰卡科伦坡南32英里的贝鲁瓦拉)—小葛兰(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奎隆)—柯枝(今印度南部西海岸的科钦)—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译科泽科特)—忽鲁谟斯。此次,还有:占城—暹罗,暹罗—满刺加,苏门答刺—溜山(今马尔代夫),古里—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南端的阿曼佐法儿),古里—阿丹(今阿拉伯半岛也门首都亚丁),苏门答刺—翠兰岛—榜葛拉(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一带),古里—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行程。^[17]参照费信《星槎胜览》,此次还有:古里—刺撒(在今红海东岸),锡兰山别罗里—卜刺哇(今索马里布拉瓦)—竹步(在今索马里南部),小葛兰—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等行程。^[9]参照《郑和下西洋图》,此次还当有小葛兰—甘巴里(今印度南端科摩林角)、加异勒(今印度南端)等。

关于回程,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述及宣德八年船队开船回洋:“忽鲁谟斯—古里—苏门答刺—满刺加—占城—太仓。”郑和船队各分船先后在古里、苏门答刺、满刺加等地陆续汇合,结船回还。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恢复和发展了亚非相应沿海国家和地区的海上交通,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

5.5 加强对外贸易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船队不仅和所访问国家进行朝贡贸易,也与其民间进行商业贸易。例如《西洋番国志》^[17]占城条有:“所喜者中国青磁盘碗等器,及纁丝绛绢硝子珠等物,皆执金来转易而去。”爪哇条有:“国人多富,买卖但用中国铜钱”,“国人最喜青花瓷器并麝香、花绣、纁丝、硝子珠等货。”旧港条有:“行市交易用中国铜钱并布帛之类。”暹罗国条有:“中国宝船到,亦遣小舡到上水买卖。”满刺加条有:“王於溪上建立木桥,桥上造亭二十余间,诸货买卖皆集於此。”苏门答刺条有:“胡椒每官秤一百金,卖金钱八个,直银一两”,“此处是总路头,所以番舡多经,物货皆有。”南淳里条有:“珊瑚土人以为宝,或碾成珠及器物卖之。”锡兰国条有:“甚爱中国麝香、纁丝、色绢、青磁盘碗、铜钱,就以宝石珍珠易换。”柯枝国条有:“名哲地者专收买宝石珍珠香货、以待中国宝船及各处番舡。珍珠以分数论价,每颗重三分半者,彼处卖金钱一千八百个,直银一百两。珊瑚连枝柯者以斤论价,做成珠者以分论价。哲地多收买珊瑚枝柯,雇匠制造成珠,论分两卖。”古里国条有:“此西洋大国也”,“中国宝船一到。王即遣头目并哲地及米纳凡来会。其米纳凡乃是本国书算手之名,牙佺人也。但会时先告以某打价。至期将中国带去各色货物对面议定价值、书左右合契,各收其一。……以后哲地并富户各以宝石、珍珠来看”,“西洋布本国名摺黎布,出於邻境坎巴夷等处,每疋阔四尺五寸,长二丈五尺,彼处卖金钱八个或十个。国人亦以蚕丝练织各色间道花手巾,阔四五尺,长一丈二三尺有余,每手巾卖金钱一百个。其山乡人多置园种胡椒,十月椒熟,俱采摘晒干,自有大户收买送官库,官与发卖,每一播荷卖金钱二百个,见数税钱。其哲地财主多收买各色宝石珍珠,并做珊瑚珠等,遇各处番舡到,王遣头目并计算人来,跟同发卖,亦收税钱。”溜山国条有:“中国宝船亦一二往彼,收买龙涎香、椰子等物。”祖法儿国条有:“中国宝船到,开读诏书并赐赏劳,王即遣头目徧谕国人,皆以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易纁丝瓷器等物。”

6 结束语

由明宣宗朱瞻基决策和驱动的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明太宗朱棣时期郑和六次下西洋的继续和终结,也是郑和七下西洋中出使国家较多、地域广、航程远、时跨三年的一次成功的大规模和和平外交与航海活动。此次下西洋航行总结吸收了前六次的经验和教训,以强大的国家综合实力为后盾,以无敌的海军特混舰队为使团船队,以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共享太平之福”的理念为指导,和平、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所体现的“各敬顺天道 抚辑人民 以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友好合作建立海外基地的经验,对于现代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建设 21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仍有值得借鉴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九·明仁宗实录:卷 1[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 [2]巩珍.西洋番国志·敕书三[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十一、十二·明宣宗实录:卷 67[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 [4]祝允明.前闻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5]马欢原.《瀛涯胜览》校注[M].万明,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
- [6]二南里人.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7]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向达.郑和航海图[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9]费信.星槎胜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七、八·明太宗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 [11]范金民.《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校读[J].郑和研究,2006,(4):52-58.
- [12]刘东瑞,卢保康.郑和铜钟小考[J].文物,1985,(1):74-76.
- [13]吴聿明.周闻夫妇墓志铭[J].文物,1985,(6):86-88.
- [14]巩珍.西洋番国志·诸国名[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明实录十一、十二·明宣宗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 [17]巩珍.西洋番国志[M].向达,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

(责任编辑 范可旭)

Mission and Contribution of Zheng He's Seventh Voyage to Western Ocean

CHEN Ping-ping¹, SUN Mei-shu²

(1.Dept. of Life Science,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17, China;

2. The Third High School of Nanjing, Nanjing 210001, China)

Abstract: Zheng He's seventh voyage to Western Ocean was the continuation and end of his six voyages to Western Ocean during the Ming Dynasty's Zhu Di period. Ming Dynasty Xuanzong Emperor Zhu Zhanji was the decision maker and driver of Zheng He's seventh voyage to Western Ocean. Zheng He and Wang Jinghong were the representing ambassadors of the voyage. Backed by strong 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 based on mixed invincible naval missionary fleet, and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peace, friendship, mutual benefit, common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the happiness of peace", the voyage was carried out with the mission of developing tributary relations between many countries and the Ming Dynasty; it mediate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o maintain regional peace; renovated overseas bases, restored and expande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transport routes; carried out trade and procurement of materials; promoted the exchanges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religion, and property in countries in Asia and Africa; consolidated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Zheng He's seventh voyage to Western Ocean, crossing 26 countries in three-year period, was a large-scale peace diplomacy and maritime activity, reflecting the concept of peac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in "respecting the heavens and the people, helping to share the happiness of peace".

Key words: Zheng He's Voyages to Western Ocean; missionary fleet; Emperor Ming Dynasty; traffic routes